

教育公平重担不应压在稚嫩肩膀上

贾杜

为人父母者有两个最基本的愿望，一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吃好穿好、身体健康，二是希望孩子能够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来自江西九江的占全喜夫妇在第一个方面做得很好，他们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但在教育方面，夫妻俩却对女儿占海特充满了歉

意，因为没能为她争取到在上海参加中考的权利，以致女儿辍学在家。

一位十五岁的花季少女，本该徜徉于午后的校园，或凝眉思索数学课上的一道古怪难题，或羞涩回忆心仪男生的一句甜蜜话语，可是因为自己没有上海市户籍，占海特无法置身于这些美好的画面。为了争取公平的受教育权利，占海特在父亲的帮助下走上了维权的道

路，维权的过程于微博约辩之后趋向白热化，其父也因公开抗议中涉嫌妨碍公务被治安拘留，随后有关地域歧视的话题也热络起来。

占海特同学的勇气值得钦佩，但争取教育权利公平的重担实在不应该压在这么稚嫩肩膀上。人生而平等，这是大多数人都认同的普世价值。不能指望所有人生来就拥有相同的生活条件，但要尽量保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技能进而改善生活条件，即所谓的机会均等。

无奈的现实是，城乡居民之间、户籍与非户籍居民之间，在教育机会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近些年来，随着城乡人口流动数量增加，一些城市里非户籍居民子女面临的升学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有些父母选择默默接受现实，让子女回到户籍地参加升学考试，另外一些父母则选择争取教育公平权利，占海特和她的父亲属于这部分人，因为这次是考生自己站上了前台，更具轰动效应。

教育权利不均等的背后实际是地区间、城乡间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衡，在整个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高的背景之下，过多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明显落后。在城市中，优质教育资源又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超大城市。以往，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不太突出，当人口流动加速之后，这一矛盾就会尖锐起来。

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教育资源同样有分布严重不均的情况存在。以北京市为例，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城、海淀和东城三个区，其他区

县明显落后。除了要求具备户籍之外，初中之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主要以房产为标准，所以想要让自己的子女就读这几个区的学校，家长们只能下血本去买房子，而这时孩子可能还在牙牙学语。当然，相比非户籍居民，这些只能算是甜蜜的烦恼。

不独教育，各种资源分布不均在中国是个普遍现象。面对分布不均的各种资源，最“公平”和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户籍，于是围绕着户籍会有各种各样生动的故事。当遇到不公平的分配时，人们习惯于攻击户籍制度，但只要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差距存在，即便改变户籍管理方式，一样无法解决公平问题，有限的优势资源面对无限的需求，很难想象不会出现混乱。当然也必须承认，资源分布不均问题的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解决不均等的办法之一是改革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

非户籍考生急迫的升学难题，显然无法通过短期内平衡资源和改变户籍制度来解决，治标之策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进行修补，比如加快异地升学制度的出台步伐，目前已经有部分省份出台了异地高考办法，虽然门槛标准不一，但出台后都引来了一片喝彩。下一阶段期待北京和上海等教育资源集中地区能有所突破，尽快出台相关办法。长期来看，还是应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教育机会公平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资源的地区分布比较均匀，城乡差距较小。中国一方面要从总量上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在欠发达地区加大倾斜力度。

城市化不是大干快上搞投资



黄小鹏

认清供给与需求

只要教会鹦鹉说供给和需求，它也能成为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如是说。

供给与需求分析是最基础的经济学工具，特别在分析单个商品、单个市场时，它简单而有力。但是，当分析对象从微观层面转向宏观层面时，它对智力构成一定的挑战，很多人甚至一些职业经济学家一不小心就迷失在两条十字交叉线之中。

在宏观分析框架中，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部分构成，而总供给曲线由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函数则取决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总需求与总供给共同决定产出和总价格水平，当总需求超出总供给时产生通胀，相反则产生通缩。总供给能力决定长期增长潜力，总需求水平决定这种潜力在短期的实现情况，决定当期GDP。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间接且慢，对总需求的影响直接、直观，所以，多数政策都是从需求角度着手，也因此，媒体也主要围绕需求政策进行报道，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为最多人所熟悉。

道理很简单，并不高深，但很容易在这上面犯错。不久前有人语出惊人：消费不是马车，投资才是增长动力。持此论者强调了资本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他似乎把总需求构成部分的投资需求与供给能力中的资本存量混为一谈，硬生生把需求面的“马车”扯到了供给方，让人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是什么重大新观点。

经济行为常同时作用于需求面和供给面，未注意到这种“一体两面”性，容易陷入一些热烈但无意义的争论。节俭还是奢侈更能创造繁荣？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命题，如果没有“一体两面”思维，你会莫衷一是。又如投资，它在当期创造了需求，但同时又以增加资本存量的方式提高了未来总供给能力。再比如，消费常简单地视为需求，其供给效应易被忽视，饥饿时产出能力大打折扣，增加食物改善健康亦能改善总供给。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医疗、教育都计入消费需求，但在卫生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中，则当作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影响一国长期经济表现的关键变量。再有，顺差是总需求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热衷于追求顺差，但国际贸易扩展了资源配置的范围，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提高供给能力，因此，顺差为蒙国际贸易仍然有利可图，但这道理并未被广泛接受。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源泉？

大费周章论述需求供给，是要用来分析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化。自决策层提出未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是城镇化之后，地方上一股大干快上之风有刮起之势。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城市化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源泉，而目前我国城市化率仅51%，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空间极其广阔，甚至有人还核算出城市化带来的投资需求达40万亿。既如此，大干快上搞投资岂不理所当然？

然而，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归结于城市化，很可能是一个误区。城市化同样有“一体两面”性，即有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从农村进入城市，自然产生住宅基建、消费娱乐等诸多需求，同时，集中居住降低了信息交流成

本，技能和知识的扩散也变得更加容易，这是它的供给效应。

试想，只有城市化产生的需求而无供给能力上去匹配，是什么结果？肯定是只有价格上升而实际GDP不能增长。由此可以推断，过去30年实际GDP持续增长，背后一定还有供给效应在与之匹配。这是集中居住带来的吗？显然不是。试想：把分散的农村居民集中到城市，同时让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经济会有增长吗？显然，这种只制造需求的行为是无意义的。事实上，任何一国的城市化都是受工业化的推动。

从供给角度看，过去高增长除人力和资本投入不断增加，其余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后者来源大致有三：一是市场化改善资源配置，等量投入产出却增加；二是科技进步，如国外先进技术的外溢；三是工业化，同样一个劳动力从事农业年收入1万元，从事工业变成3万元，劳动力仍为一人，但GDP瞬间就增加了2万元。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同步，工业化走得快而城市化走得慢。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的国家，工业化增加供给能力，而城市化产生需求。在供给与需求基本匹配的情况下，说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还是说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都是成立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从供给角度，后者从需求角度。但是，在两者不同步的中国，断言过去30年经济增长源于城市化，不说全错，至少也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是工业化推动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

跨越收入陷阱靠产业升级

如果承认30年的增长来源于工业化，那么，接下来能否继续创造奇迹，关键就在于两点：一是能否继续工业化，即继续有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二是现有非农业部门能否不断升级（如同1万元收入的农民变成3万元收入的工人）。

事实情况没有某些人预测的那么乐观。中国的工业化率远高于城市化率，目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降至10%左右，今后即使有所下降，空间也会有限。从劳动力转移潜力看，根据经济学家李迅雷的测算，可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只有4000-6000万。即便退一步，从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角度，情况也难乐观。目前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为51%，但这一数据存在大幅低估，有的估计城市化率已超过60%，这应该是可信的，也与我们直观观察相一致。如果按远期75%目标，目前中国城市化也已经进入了末期阶段。

正如前述，单纯的城市化，而没有相应的产业升级（从农业到工业也是一种产业升级），城市化就徒具需求创造功能，它所制造的就只是需求泡沫，而不是一国长期增长的基石。但是，制造需求要比改善供给容易得多，特别是近些年来地方政府掌握了制造需求的法宝——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所以，当决策层提出城镇化大计之后，他们的兴奋劲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什么比大干快上搞房地产更让地方政府兴奋的呢？但是，这些人根本没有理解十八大报告的深刻内涵，报告中“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句话，他们要么是没注意，要么是有意忽略了。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在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继续较快地提高人均收入，关键要靠产业升级，它既包括继续降低农业占比，也包括现有工业和服务业向更高层次爬升，还包括原有农业部门的继续现代化。过往，是工业化让城市化变得有意义，未来城市化也只有与产业升级完美配合，才是有价值的。这是从供给角度得出的可靠结论。沉迷于城市化制造需求的迷梦中，偏执于搞投资，只能制造繁荣假象，甚至会导致城市化与贫困化并存，而这种危险的迹象已经在很多地方初露端倪，当引起高度警惕。

新兴经济体三大风险当警惕

张莱楠

发达国家债务风险的外溢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了巨大冲击，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债务、金融三大风险应引起高度警惕。

相关数据表明，从1824年到2004年，世界各国共出现过257次主权债务危机或违约，这些主权债务危机的发源地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经济体，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是20世纪下半叶最为严重的三次债务危机，而我们当下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策源地则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截至目前，全球主权债务达到了7.6万亿美元。排名前10位的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总和占全球的83.8%。

发达国家债务问题传导的结果，就是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开始逐步暴露。债务风险首先来自于经济增长放缓。新兴经济体增长步伐各异，但几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同步放缓。从增长态势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从高位“逐季回落”，三年多来首次季度增长“破8”的一年。此外，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到今年三季度本轮经济回调已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也明显偏离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水平。巴西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9%，环比仅增0.6%，创下近年来的最低点；印度第三季度GDP增速从第二季度的5.5%下滑至5.3%；俄罗斯三季度GDP同比增幅仅为2.9%，远低于第二季度的4%。

更加深远的是，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对新兴经济体既有发展模式产生了冲击。总体看，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以充裕资源或要素作为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以出口驱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为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带来了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蕴藏了两大结构性风险：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依赖趋势的加重。当前，发达国家债务危机通过出口收缩和信贷紧缩打击了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同时，也使一些国家“高出口、高投资、高举债”的对外依附型增长模式

受到重大冲击。

根据汇丰的调查，由于发达国家需求疲软令制造业产出下滑，被调查的18个新兴经济体中有11个新订单减少，整体采购活动在近四年来也首次下降，这直接导致贸易收支状况出现恶化。从经常账户和财政余额占GDP比重这两项指标来看，新兴市场中有三个国家（印度、南非、巴西）处于“双赤字”情况，其中印度的情况尤为严峻，2011年印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高达8%，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达到2.5%，而如果衡量债务占GDP比重指标的话，巴西和印度两国为新兴经济体中政府债务比例最高的。IMF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印度政府债务总额占GDP之比已达68.1%，巴西为66.2%，均已远超新兴经济体37.6%的平均水平。由于财政赤字高企，经济增长乏力，标普先后将南非和印度的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调降至“负面”，并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调至BBB-级。此外，越南、菲律宾、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等新兴市场国家也饱受“双赤字”困扰。因此，不排除个别新兴国家由于外部冲击触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金融风险方面，新兴经济体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也开始逐步暴露。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直接融资市场的有限体量，新兴经济体多数存在经济“过度银行化”特征，特别是储蓄率较高的亚洲，表现为银行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较高等。目前来看，新兴经济体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上升。9月27日，穆迪宣布下调阿根廷30家银行信用评级；8月，穆迪下调了越南最大私营银行亚洲商业银行的评级，而越南银行业的总坏账率已经从2008年的3%大幅攀升至10%；二季度，印度央行对100家银行的调查显示，银行坏账已经对印度金融系统构成了最大风险，新兴经济体尾部金融风险仍不容小视。

需要高度重视的是，经济和债务和金融风险稍有不慎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短期内亟须管控可能产生的风险，而长期看，加快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模式刻不容缓。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焦点评论



南京取消公费医疗，副厅级以上干部除外

公费医疗要取消，改革方向是社保。厅级干部搞例外，南京人民有牢骚。等级观念得照顾，公平诉求受煎熬。坚决铲除官本位，特权头上敢动刀。

赵顺清/漫画 孙勇/诗

附赠认沽证难以根治企业造假上市

熊锦秋

据报道，上交所有关部门正研究创新股发行方式，比如在新股发行时向投资者赠送略高于发行价的认沽权证，投资者可在三年后行权。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一个有益的制度突破，将有利于保护新股认购者的权益，但还不宜寄予过高期望，因为它仍难以从根本上抑制造假上市等问题。

首先，应考虑如何让这种发行方式兼顾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所谓认沽权证就是看跌期权，也就是行权期一到，持有认沽权证的投资者可以按照约定的价格卖出相应的股票给发行人等。但在现实中，一级市场新股投资者在获得发行人所赠认沽权证后，其持股时间并不一定就长达三年，比如说在股价高于发行价时它可以抛售，此时股票转移到了二级市场投资者手里，但是认沽权证并不一定自然而然的到达这些二级市场投资者手里，因为股票市场归股票市场，权证市场归权证市场。一级市场投资者以高于发行价抛售股票获利后，并不一定抛售认沽权证。如果三年后股价跌破

发行价，认沽权证就具有价值，一级市场投资者还可再抛售这些认沽权证得利，但从股票二级市场买入正股的投资者，它们的利益却可能没有任何保障。

可以说，投资者利益保护重点从来就不应该是一级市场投资者，因为新股不致往让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新股有所斩获，或者它们可以通过二级市场炒作将风险转嫁到二级市场投资者那里，新股发行的风险最终并非在一级市场爆发，而是在二级市场爆发。因此有必要仔细推敲做好相关制度设计，是否可考虑认沽权证无偿与股票捆绑在一起流转等办法，如此或可部分兼顾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

即便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其它更为严重的漏洞，那就是这种设想的发行方式下，发行人仍可通过造假上市从中套利。按此种新股发行方式，如果三年后股价跌破发行价，发行人需按略高于发行价的价格回收对外发行股份，可能会吃点心亏；不过与此同时，发行人巨量原始股也解禁了，原始股与社会公众股的比例往往为75:25甚至为90:10，其中具有杠杆效应，且由于原始股成本极为

低廉，杠杆效应极为巨大。

举个例子。按目前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股权分布方面的要求，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不得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0%。假设某大股东发行人以每股1元成本价持有上市公司股份36000万股，向社会公众以每股10元价格发行4000万股；认沽权证约定投资者可在三年后以11元价格卖出。三年过后，股价跌到6元，发行人以11元回收全部4000万股社会公众股，每股账面亏5元；但其原始持股36000万股每股账面赚5元。盈亏相抵此时账面盈利16亿元。

在现实中，大股东如果要回收社会公众股，由此社会公众股可能不足10%比例，将触及股权分布退市红线，为了维持上市资格，与此同时大股东等就必须“顺水推舟”在二级市场或大宗交易市场大量减持股票，甚至先减持、后回收。回收4000万股亏2亿元、减持4000万股原始股赚2亿元，最后大股东等可能维持36000万股持股不变，其中32000万股持股成本为1元、另外4000

万股持股成本为6元。由于壳价值非常高昂，股市再怎么跌，恐怕也难跌破发行人成本价，随着今后大股东进一步减持，造假上市等危害将由更多二级市场投资者来承担。

可见，新股发行同时赠送认沽权证的发行方式，发行人只要上了市，即便包装造假被发觉，大股东等按约定价回收社会公众股也只是吐出圈钱所得和利息，自己并没有太多真正损失；而且三年解禁期一过就可大批抛售巨量原始股套现。因此，设想中的这种发行方式要想成功，同样必须考虑解决好大股东减持问题，这是新股发行和市场最需解决的核心大问题。

笔者认为：公司股票上市，投资者假设其发行上市材料真实，才在二级市场制造出价格，但如果发行上市材料存在包装甚至造假、上市后业绩迅速变脸，那么发行人违反契约精神在先，大小限是否还可以自然而然在限售期过后，就享有以二级市场价格随便流通减持套现权利，理论上值得探讨。因此，应考虑对包装造假的上市公司，限制大小限的上市流通权。有此制度安排，发行人造假上市就将无利可图，如此才可彻底打消其造假上市念头。